

导言：中美贸易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理论的诠释

落后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贸易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经济学界一直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并最终形成了正统学派与激进学派两大学派的长期对立。正统学派认为，对外贸易是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激进学派则强调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使其“贸易条件恶化”。孰是孰非，莫衷一是。

1 对外贸易是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一些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包括新古典学派和后凯恩斯学派，纷纷撰文，强调对外贸易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特别是新古典学派将对外贸易视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W·A·刘易斯。

刘易斯在他的大量著作中论述了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对落后国家来讲，对外贸易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且是调节国内各部门发展的重要力量。国际贸易不仅可以扩大落后国家的总产出和出口，而且可以通过进出口贸易来

实现工农业的协调增长。比如，当工业增长落后于农业时，可以通过出口农产品来换取外汇，再用这些外汇来进口资本品、中间产品、原料等工业发展必须的投入品，以促进工业生产的增长。刘易斯还认为，落后国家的对外贸易增长率同经济增长率密切相关，发展外贸可以直接推动经济增长。但外贸的扩大主要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二是贸易条件。发达国家的外贸（主要是进口）与经济增长成正比关系；而落后国家的外贸与发达国家的进口和经济增长密不可分。因此，落后国家的外贸“依赖于工业化国家的繁荣”。发达国家控制落后国家的“增长速度的主要环节是贸易”。“当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较快时，它们的进口增长速度也加快，从而落后国家就出口得更多”。他还根据统计资料证明：“落后国家初级产品出口增长正好是根据发达国家生产增长率所能预测到的 $\frac{2}{3}$ ，不多也不少。”

除了刘易斯之外，正统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扩大对外贸易是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外贸可以增大产出、促进经济增长；可以促进落后国家技术水平的提高、改进生产方法；可以改变落后国家的经济结构；可以为落后国家引进先进的生产方式、经济体制、思想观念、文化、新知识、科学技术、竞争意识等现代化的东西，促进落后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摆脱传统的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思想文化、制度的束缚，树立新的商品经济观、市场与竞争观、利润观等新的意识，建立新的经济体制，学会利用市场机制，以改变社会结构的僵化，增强其灵活性，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和环境；对外贸易还可以为政府创造收入（关税等）来源，增加政府储蓄；同时，外贸出口有利于国际收支平衡。

对外贸易是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得到了论证，而且在实践上经受了经验验证。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如钱纳里·沃尔什(B. M. Walsh)、赛伦(R. F. Syron)、斯坦(L. Stein)、梅泽尔斯(A. Maizeis)、马赛尔(B. F. Massel)、佩尔森(S. R. Person)等人，运用对单个国家的时间序列分析法和对不同国家的交叉分析法，研究了 50~60 年代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大量历史资料，分析了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的一致结论是：对外贸易与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直接的联系，即外贸增长越快，经济增长就越快，反之则反是。也正因为如此，这些正统理论构成了以后发展经济学的主流。

2. 对外贸易使落后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的激进派兴起，他们对正统理论提出了挑战。早在 1950 年，阿根廷著名的经济学家普雷比什(Prebisch)就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首次提出了“中心—外围”学说，并集中论述了“贸易条件恶化论”。普雷比什把世界经济体系分成两部分：一是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工业国中心地带；一是由落后国家组成的外围地带。外围地带总是围绕着中心国家意志而发展。表现在国际贸易方面，外围地带国家的贸易条件趋于长期恶化。

1950 年 5 月，德国出生的经济学家辛格(H. Singer)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论投资国和借贷国之间的利益分配”一文，提出了与普雷比什大致相同的理论。因而“贸易条件恶化论”被合称为“普雷比什—辛格假说”(Prebisch-Singer Hypothesis)。他们认为，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由于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的恶化，形成了不利于落后国家的不等价交换。贸易的结果使落后国家的财富流入发达国家，导致贫国愈

贫，富国愈富。他们的主要论据是：

(1) 落后国家的初级产品和发达国家制成品的需求弹性不同，因而需求增长率不同。作为投入物，农矿初级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较低，在价格降低的情况下，扩大出口量并不会带来出口收入的同比例增长；不仅如此，在恩格尔定律的作用下，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也较低。这意味着实际收入的增量中用于购买农产品的支出部分所占比例趋于缩小，农产品需求扩大的余地小于制成品的需求。初级产品需求的这种低弹性与供应的低弹性结合在一起，更加剧了初级产品价格的不稳定性和贸易条件的极大变动。

(2) 初级产品的节约和替代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减少了原料性初级产品的世界性需求。技术进步降低了工业生产中原料的消耗系数，使对落后国家原料的进口需求并不随工业国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同步扩大；人工合成代用品的开发则直接替代了相当部分的原料需求。

(3) 工业国的企业（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掌握着技术优势，工业制成品中的技术含量较高，因而制成品的出口价格中包含有技术创新租金；由于跨国公司的规模和实力，其中还包含有垄断利润。

(4) “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商品市场及劳工市场结构不同，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利益的分配方式也就不同。位于世界经济中心的发达国家，由于工会的强大压力和产品市场上垄断势力的存在，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的成果只会带来工资和利润的增加，即转化为生产要素拥有者和使用者的收入增加，而不是通过降低价格的形式馈赠给消费者。而在落后的“外围”国家，由于劳工的组织程度低，工会的压力相对较小，加之剩余人口

造成的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工资遂被压到最低生活水平上。另一方面，生产初级产品的厂商亦无良好组织，彼此竞相供给，因而将产品价格压到平均成本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存在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此取得的利益也会以价格下降的形式全部或部分转移到“中心”国家的买主手中。这一价值跨国转移过程就是落后国家贸易条件日益恶化的过程。

普雷比什和辛格的命题在落后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颇受青睐，也得到不少经济学家的支持，如提出“依附论”和“不平等交换论”的激进主义学派伊曼纽尔（A. Emanuel）、阿明（S. Amin）和弗兰克（A. G. Frank）等等。

普雷比什和辛格的假说也经受过实践的检验。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落后国家的贸易条件确实在继续恶化。事实证明，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仍处于有利地位，而落后国家则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境地。

落后国家的贸易条件的日益恶化，无疑是其对外贸易乃至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迄今为止，落后国家初级产品出口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大。所以，如何提高或稳定初级产品的价格，成为改善落后国家经济和贸易地位的关键环节。这也是落后国家强烈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项主要内容。

3. 评价

正统学派的理论观点与激进学派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正统学派强调了积极的一面：通过对外贸易引起发达国家的商品、资本和技术向落后国家转移。激进学派则强调了消极的一面：发达国家以贸易为手段，牺牲落后国家的利益，导致国际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两种观点都有可取的一面，也都有一定的片面性。

二、中美贸易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是对西方发达工业国的贸易，中英贸易、中日贸易和中美贸易构成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三大主要组成部分。但三大对外贸易的地位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1894 年以前，中英贸易独占鳌头。英帝国在鸦片战争前和战后初期，一直居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垄断地位，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 80% 以上。1894 年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被英日美三国瓜分和控制，三国占中国进口贸易的 70~80%，出口贸易的 60~70%。但中日贸易上升最快，到 1930 年取代中英贸易的地位而居首位。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中美贸易飞速发展，逐渐取代中日贸易的地位。到 1945 年中美贸易开始独占中国的对外贸易。

中美贸易在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它必然对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中国对美国贸易的贸易条件来看，总的来看虽然并不完全有利于中国，但也未见明显恶化。中国对美的综合贸易条件从 1920 年以后逐步有所改善，这与中国对外贸易的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的个别贸易条件变化较大：一些传统的对美出口商品如茶叶、生丝等，其贸易条件的确未见改善，有的在持续恶化；一些新兴的对美出口商品如植物油、桐油等，贸易条件逐步有所改善；还有一些新兴的出口商品如生牛皮、草帽缬等，其贸易条件有恶化的趋势。

中国自美进口商品的个别贸易条件差异较大：自美进口的农产品如面粉、棉花、烟草等，其贸易条件大致以 1920 年为界，

前期有恶化的趋势，后期则有明显的改善；自美进口的工业品如煤油、铁轨、纸、帆布等，其贸易条件有的有持续恶化的趋势（如煤油），有的变化不定（如铁轨、纸、帆布等）。这说明中国在用农产品交换美国的工业制成品时并非完全处于不利的地位。

从中美贸易对中国的国际收支的影响来看，影响虽然有限，但是有增加的趋势。1895 年以前，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对中国国际收支的影响是积极的、有利的；1895 年以后，中国对美贸易基本上是连年逆差，特别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巨额贸易逆差居高不下，加剧了中国国际收支的逆差。

与中日贸易、中英贸易相比，中美贸易对中国国际收支的消极影响最小。从整个近代中国对日、对英和对美贸易平衡来看，中英贸易造成的贸易逆差最大，中日贸易次之，中美贸易最小；从 1894 年后三大贸易的发展状况来看，中日贸易对中国的国际收支的影响最大，中美贸易上升到第二位。

还应该看到，与中日、中英贸易相比，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时间最长。从 1784 年到 1895 年，在长达 110 多年的中美贸易中，顺差始终在中国一边，这是中英贸易、中日贸易无法做到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贸易顺差也在中国一边，而中国对英、对日贸易却出现巨额逆差。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贸易减少了国际贸易对中国国际收支的不利影响。

从中国对美国贸易的商品结构来看，中美贸易对于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近代中国对美进口贸易的商品结构基本上以工业制成品为主，附之少量的以工业原料为主的初级产品，中国是美国工业品的一个重要的销售市场。但在工业制成品中，重化学工业品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说明美国在中国近代工业化过程中，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轻工业产品所占的

比重越来越小，说明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曾经对美国的轻工业产品起到过替代的作用。

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基本上以初级产品为主，附之以少量的工业制成品，中国基本上是美国的原料供应国。鸦片战争以前是这样，鸦片战争以后也是这样，惟一的变化是初级产品的种类不断增多。出口到美国的初级产品主要是供美国工业做深加工的原料或半制成品。但中国也有少量的工业制品出口到美国，这说明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中国工业化的成果。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工业品数量远远多于出口到日本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对中国工业化的积极贡献多于日本。

中国对美贸易结构对于中国近代的经济的发展有过积极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比较利益。中国作为农业国，对美输出大量的农副产品，对于较充分地利用中国农业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中国对美出口初级产品特别是半制成品，促进了出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兴起；从美国进口的装备产品和某些普通产品促进了美国工农业先进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对于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但是也应该看到，近代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由于是在资本主义体系的背景下开展的，而中国又是一个丧失主权的、落后的、低开发国家，因而也产生了一些不利于中国的后果：

第一，中国由于缺乏关税保护，对美贸易入超的数额越来越大；同时，进口工业品和出口农产品交换中存在剪刀差，使美国资本家获得了大量的贸易利润，使我国财富大量外流，造成货币积累严重不足，从而阻碍了工业化的进展。 1869 年到 1936 年，

中国对美贸易逆差总额达到 15 亿海关两。^①巨额的贸易逆差使中国财富外流，资本积累不足，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

第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民族工业兴起以后，同类美国产品继续出口、争夺国货市场，这种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排挤了民族工业。战后美国对华物资倾销，使中国的民族工业蒙受意外的损失。

三、结 论

对美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尽管近代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结构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尽管对美国的贸易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不过就正常的贸易本身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对落后的中国产生有益的作用。正如美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郝延平教授所说，中美贸易是技术转移的媒介，给中国带来了崭新的生产技术，美商企业给中国商人提供了企业管理经验与企业家精神。无疑地，中国在同美国贸易的过程中所学习到的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业技术的知识，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近代化以积极的影响。

① 见本书第七章表 7-3

上篇 中国对美国贸易的历史分析

第一章 鸦片战争以前的中美贸易关系回顾

(1784—1844)

一、鸦片战争以前中美贸易概况

美国在独立以前便和中国发生了贸易关系。不过，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当时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北美 13 个州的对华贸易，是通过东印度公司进行的。东印度公司在中美之间主要进行茶、人参和毛皮的交易，既将中国的茶运往美洲，又把北美的毛皮、人参售于中国。^①因此，广阔的中国市场和诱人的中国商品，对新生的美国并不陌生。

美国和中国直接通商，还是在独立以后因为英、法等国对美国的贸易的限制而开始的。独立后的美国由于退出了英国殖民地体系，其海外贸易受到英国的百般阻挠，昔日贸易频繁的加勒比海地区在英国的控制下变成了可望不可及的禁区；同欧洲的贸易也受到英国和一些封建王国的排斥。为了生存，为了经济上的独立，美国开始把视线转向亚洲。

① 潘序伦著：《美国对华贸易》(Shu-Lun Pan: The Trad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China)，纽约版，1924 年，第 5 页

1784 年夏季,“中国女皇号”(EMPRESS OF CHINA)自纽约载着一批洋参到达广州,这是到达中国的第一艘美国商船,开启了中美贸易的新篇章。美国商人由于第一次同中国人打交道,一无经验,二无可以仗势的强国作后盾,更重要的是当时他们把中国当作惟一的可能寻求的商业出路,因此,处处小心谨慎,循规蹈矩,受到了广州商人的友好接待。顺利地售出了全部货物,并购入他们所需要的茶、丝绸、瓷器等,其中红茶 2460 担,绿茶 562 担,瓷器 962 担,丝绸 490 匹,肉桂 21 担,总值 99676 元。另外还有棉布、香料等。

“中国皇后号”东航之行为美国资本家展示了赢利的航向。纽约诸报登载的有关“中国皇后号”广州之行的消息,掀起了美国国内对华贸易的热潮。波士顿、普罗维登斯、纽约和费城的资本家争先恐后地驶往广州。

由于有利可图,对华贸易便很快发展起来。1790 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总值占美国进口总值的 1/7。1792 年,美国对华贸易额已超过荷兰、法国、丹麦等国,仅居于英国之下。1803 年,美国对华贸易的总值,超过了欧洲大陆诸国对华贸易的总和。^① 19 世纪上半期,美国对华贸易额仅次于对英、法、古巴的贸易,居第四位。^②据统计,到达广州的船只,1790 年为 14 艘,1805 年增为 34 艘,1810 年为 37 艘。以后,每年来华的船只多少不等,在 1815 年到 1839 年间少则 18 艘,多则 229 艘。比

① 威廉·米尔本著:《东方贸易》(William Milburn: Oriental Commerce),伦敦,1813 年第 2 卷,第 486 页。

② 参考伊萨克·史密斯·霍曼斯编:《美国外贸历史统计表》(Issac Smith Homans: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Foreign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纽约。1857 年

较两国进出口的总值，美国经常处于入超的局面，如美国输出到中国的商品的总值 1795 年为 519,617 元，1840 年为 1,009,966 元，而这两年自华输入的商品的价值分别为 1,144,163 元和 6,640,829 元。^①

(一) 中美贸易的商品结构

1. 中国输向美国的主要商品和种类

中国输美的商品主要是以茶叶、生丝和丝织品、土布、瓷器等为主，见表 1-1：

表 1-1 中国对美输出的主要商品及数量 (1784-1843)

年份	茶叶 (担)	土布 (匹)	生丝 (担)	丝绸 (匹)	年份	茶叶 (担)	土布 (匹)	生丝 (担)	丝绸 (匹)
1784	3022	864		490	1814	7133			115,939
1785	5213				1815	53,040	640,900	311	114,147
1786	8864	33,920			1816	70,455	1,794,000	229	201,536
1787	5632				1817	169,143	1,469,000	746	291,396
1788	8916		256		1818	90,287	2,289,600	823	201,536
1789	23,199		660		1819	76,447	2,932,000	926	292,396
1790	22,860	166,700	184		1820	40,153	1,761,528	250	281,187
1791	7397		55		1821	37,322	1,199,207	288	354,864
1792	8077	27,400	25	155 担	1822	49,983	2,522,000	158	375,340
1793	15,075	255,000	36		1823	61,590	536,000	47	348,670
1794	18,461	220,000	3		1824	67,025	721,000	146.5	573,807
1795	17,810	685,000			1825	76591	248,725	586	618,564
1796	17,331	475,000	97		1826	75,761	308,700	287	303,885
1797	15,067	200,000	283		1827	44,078	619,000	1909	420,494
1798	14,186	1,530,000	61		1828	57,820	353,000	220	211,310
1799	33,769	735,000			1829	45,287	305,568	380	169,391

①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57 年，第 181 页。

1800	28,488	6366	35		1830	64,587	125,774	639	261,117
1801	30,659	1,400,000	138		1831	38,881	122,285	459	265,117
1802	32,032	750,000			1832	74,318	39,000 +	144	215,219
1803	45,420	630,000	11		1833	109,826	46,845	123,982 +	
1804	27,178	2,648,000		9385	1834	122,153	6443 +	79,000 +	1,010,158
1805	38,405	2,808,000	55	24,960	1835	108,144	49,906	4000 +	927,017 +
1806	51,544	1,764,000	4	17,680	1836	226,849	35,990 +	125	800
1807	60,831	2,922,000	43	20,400	1837	127,400	27,049 +	99,000 +	2,104,981
1808	36,104	345,000	126	9132	1838	108,163	2379	16,000 +	965,572
1809	11,123	3,769,000	144	53,273	1839	70,141	2000		987,183 +
1810	58,811	2,048,000	178	77,710	1840	150,087		142,000 +	780,000 +
1811	22,642	425,000	195	110,521	1841	86,728		166,000 +	287,000 +
1812	22,926	201,000	36	12,670	1842				
1813		105,000	43	6470	1843	106,957		285 箱	4 担

资料来源：汪熙编《中美关系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07页。

从表 1-1 可以看出：

中国输向美国的第一大商品是茶叶。茶叶是早期中美贸易中大宗而较为稳定的商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茶树的国家，素有“世界茶叶的祖国”之称。随着中国茶在世界上各地享有盛名，并早已是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据优势的商品，到中美直接通商时，茶叶当然也不例外地成为中国输美的主要商品。对美国来说，大批购买中国茶叶，一是为了与英国争夺茶叶市场，二是由于美国国内对中国茶叶的需要。在殖民地时期，中国的茶叶就在北美享有盛誉。到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整个殖民地人民早已习惯于把茶叶当作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饮料了。美国独立后，促使美国商人组织“哈里特号”和“中国皇后号”远航中国的主要目的就是想买到中国的茶叶。“中国皇后号”从广州装运回程的货物，仅茶叶一项就占货载总额的 92.10%。据统计，

在 18 世纪最后 10 年间，输往美国的茶叶平均每年为 17,000 余担，而到了 1831 年至 1840 年的 10 年间，中国输往美国的茶叶上升到每年平均 113,600 担左右，增长了 5 倍（参见表 1-1）。随着中美贸易的发展，茶叶在美国引起广泛的注意，并一度掀起了对华茶叶“贸易热”。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后，茶叶始终是中国输往美国的最大宗商品。

美国人对茶叶的需求也不断提高。19 世纪 20 年代以后，输美华茶大部分用于美国本国人民的消费，只有一部分再转运他国。19 世纪 30 年代，美国平均每人每年茶叶的消费量为 0.54 磅，到 40 年代，消费量已经接近 1 磅（0.99 磅）。^①最初多为质次价廉的武夷红茶，后来改为质量较好的红茶小种。1800 年以后，高级绿茶，尤其是熙春、雨前和副熙等品种，越来越受到美国人的青睐。

中国输向美国的第二大宗商品是丝绸和生丝。色彩艳丽、光滑柔软的中国丝绸和生丝在美国久负盛名。1819 年后的近 20 年间，丝绸和生丝在美国购买中国商品的货单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 世纪中期以后，由于美国纺织工业的兴起，也由于日本生丝的竞争，到 30 年代，生丝和丝绸的比重下降了，中国丝绸在美国市场的优势逐渐丧失。

中国输向美国的第三大宗商品是土布。中国土布在欧美一直有“经久耐用和价格确属低廉”的好评，在西方有着广阔的市场。在一个时期内，据说连英国纺织中心曼彻斯特工厂生产的

^① 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中国茶叶研究社翻译及出版，1949 年，下册，第

11 页。